

周珏良翻译思想研究

李天竹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北京 100083

摘要: 周珏良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出色的作家和诗人、英美文学研究界专家、比较文学研究开创者、优秀的编辑工作者, 还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工作者。作为翻译家, 他多次承担党和国家重大外交活动的口译工作和重要政治文献的笔译工作, 并留下了多篇文学译作, 为新中国的政治翻译和文学翻译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翻译理论工作者, 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翻译主张, 包括语法翻译法、分步翻译法和译述法, 以及口译练习方法和口译员职业素养, 形成了周珏良翻译思想, 体系完整、前瞻性, 为我国翻译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翻译家; 周珏良; 口译; 政治翻译; 文学翻译

Research on Zhou Jueliang's Translation Thoughts Jueliang's

Li Tianzhu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Zhou Jueliang was a famous educator, an outstanding writer and poet, an expert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 pioneer in literature research, an excellent editor, and also an outstanding translator and translator theorist. As a translator, he undertook the oral interpretation work of major diplomatic activities of the Party and stat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important political documents many times, and he also left many literary translations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olitical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undertakings of New China. As a translator theorist, he put forward his own unique views on translation, including the method of translating by grammar, the method of step-by-step translation, the method translating by telling, as well as the method of practicing in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interpreters, which formed the Zhou Jueliang's translation thought, with complete system and a strong forward-looking,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lation research of our country.

Keywords: Translator; Zhou Jueliang;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0 引言

周珏良(1916-1992)出身名门,学贯中西,“诗精中外,书追晋唐”(周一良,2002:157),在我国英语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他不仅是一位外语教育家、英美文学研究界专家、比较诗学研究开创者,还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王佐良,2016)。周珏良曾任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当年少有的能够同时胜任高水平笔译和口译工作的人才。虽然翻译成果卓著,周珏良对待自己翻译工作的态度却十分谦虚,曾说:“数十年来我是翻译界中一个打杂的”(周珏良,1990:290)。周珏良的笔译成果分为政治翻译和文学翻译,后者以诗歌和散文为主,也有小说和文艺评论文章,语言隽永,耐人寻味。他边翻译边思考,提出了自己独到的

的翻译主张,为我国翻译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翻译实践概述

1.1 口译实践概述

周珏良主要的口译活动为党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和外事活动。1949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成回国后,周珏良于1950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授,兼翻译教研室主任,其间多次被借调参加国内国际重要会议的口译工作(《中国翻译家词典》编写组,1988:735)。1956年,周珏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声传译工作(徐天,2022),在北京西苑饭店的中共八大翻译处封闭工作,对大会文件和讲话进行文字翻译,并为大会开幕式进行同声传译。大会之所以安排同声传译,是因为有许多兄弟党的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大会(刘德有,2012),周珏良担任印度议会代表团的首席翻译(周礼均,2019)。此外,周珏良还于1960年11月参加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

入党代表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工作, 1961 年 5 月至 1962 年 7 月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工作(周启朋, 2016)。

1.2 笔译实践概述

周珏良的笔译活动分为政治翻译和文学翻译。1950 年至 1975 年期间的政治翻译活动主要为国内国际重要会议的笔译工作, 1953 年至 1954 年, 周珏良赴朝鲜在开城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担任谈判文件翻译(周启朋, 2016)。1975 年至 1980 年调任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期间, 参与了 197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 此外主要从事国家领导人著作的翻译, 参与审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诗词》和《周恩来选集》的英译工作(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1)。

周珏良的文学翻译活动集中在从外交部回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之后。由于研究文学理论, 他对文学理论的翻译很注意(周珏良, 1990: 290), 文论译著有美国学者麦克兰(Norman MacClean)的《<李尔王>分析》《济慈论诗书简》惠特曼的《1855 年<草叶集>序言》, 其中第一篇使用了他提出的名为“译述”的翻译方法。

周珏良的文学作品译著还有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水手毕利·伯德》、英国贵族蒙太古夫人的《蒙太古夫人书信选》、赫胥黎的散文《论舒适》、萧伯纳的《贝多芬百年祭》,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霍普金斯的诗作三首, 以及二十世纪七位英国诗人的诗作十首。周珏良的文学译著体裁多样, 涵盖了小说、书信、散文和诗歌, 体现出其卓越的文学素养和翻译能力。

2 翻译思想研究

2.1 笔译思想

2.1.1 翻译的本质: 理解和表达

在周珏良看来, 翻译说到底是“理解原著的问题”和“在另一种语言里表达的问题”, 而“表达要以理解为前提”(周珏良, 1990: 284-285)。为翻译而做的阅读和理解是相联系的, 因此有“阅读即翻译”之说(周珏良, 1990: 287)。周珏良认为, 为翻译而阅读有三个层次。首先, 必须是细读, 一字一句乃至上下文都弄清楚。第二, 如果是文学翻译, 则要考虑到一个字在一句话、一段话乃至全文或全书中的意义。第三, 文学作品中的字和词带有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这是译者需要考虑的另一层次的意义。(周珏良, 1990: 285-286)

对于翻译的表达, 周珏良认为需要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译文语言风格的选择, 第二个是原文隐喻和意象

的处理。周珏良认为译文用什么样的语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抉择, 对于现代语作品而言, 他个人喜欢用一种“提炼了的白话”, 既是白话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书面语, 不多带文言腔调。对于较旧的或古代语写的作品而言, 周珏良认为还是依照古代文学对现代读者的效果为好, 因为不可能确切了解古代文学对当时读者的效果如何, 而且翻译作品是为现代读者看的。(周珏良, 1990: 287)

关于如何处理原文中的隐喻和意象, 周珏良指出, 把原文意象直接搬到另一种语言去, 有时也能获得很好的效果; 但也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现象, 在一种语言里引起某种联想的隐喻和意象, 到了另一种语言里却不能照搬, 而要另换一个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周珏良援引自己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经历, 举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隐喻为例。例如“右翼骨干”这一政治名词, 如果在英语里把“骨干”译成“backbone”(脊梁骨), 整个词译为“the backbone of the right wing”, 就会引起可笑的联想, 因为脊梁骨在两翼之间, 不可能长在翅膀上的, 所以只好改一个意象, 译为“the nucleus of the right wing”, 反而能接近原文的效果。(周珏良, 1990: 289)

2.1.2 笔译的目的、作用和分类

周珏良指出, 笔译实践可以有不同的目的, 如科学、宗教、政治、文化等目的(周珏良, 1984: 8), 他主要探讨的是文学翻译。在文学翻译中, 由于读者不同, 翻译的作品的档次也会有所不同。周珏良认为各种各样的作品都需要翻译, 即使是不为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的、所谓“中档”的通俗文学也是需要翻译的, 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要(周珏良, 1984: 8)。关于文学翻译的作用, 除了帮助不读原文的读者体会到文学阅读的乐趣, 周珏良站在文学研究者的角度, 指出“能够起到帮助研究比较文学的作用”, 而且从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出发, 看到了文学翻译“对于文艺创作也能起到借鉴作用”。(周珏良, 1984: 8-9)

根据作用的不同, 周珏良认为文学翻译可以分为两类: 辅助阅读原文的译文和替代原文的译文。辅助读者阅读原文的译文需要一字一句紧贴原文, 文字略生硬一些也不太要紧。替代原文的译文服务于不读原文的读者, 也是大多数文学翻译所属于的范畴。这种译文整体的效果最重要, 对细节准确的要求可以灵活一些, 要使读者读后基本能够得到如同阅读原文的效果或乐趣, 也就是所谓的“效果对等”(equivalency of effect)⁹(周珏良, 1984: 9)。至于此处的读者和效果对等到底指什么, 周珏良认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时, 总会有一个心中的目标读者, 而且对于目标

读者的假设也会随着所译内容的不同而不同(379)。周珏良指出,替代原文的译文还有一种类别,就是以原文为出发点,进行重写或再创造以适合读者的喜好,最著名的就是林纾的翻译,以及庞德(Ezra Pound)对于中国诗的翻译(周珏良,1984:9-10)。

周珏良高度重视翻译的效果,认为译书不是为自己看的,“总要考虑到效果、考虑到读者”。又因为读者要求不同,就给翻译带来了困难。周珏良对于文学翻译的读者群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思考,将其分成四类:普通读者、懂外文的读者、文学研究者和外语学习者。文学翻译的大部分读者“不懂外文,要求译文流畅有味道,对于不准确之处不甚在意”;懂外文的读者会“注意到译文是否准确”;部分文学研究者“不懂某一种语言,要靠译文进行该语种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外语学习者“需要译文作为对照来读懂原文,因此希望直译而非意译”(周珏良,1994:393)。考虑到上述不同读者群体对翻译作品的不同要求,周珏良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针对不同要求的读者提供不同的译本。文学翻译可以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也可以对同一部作品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周珏良,1994:394)。

2.1.3 笔译的方法

基于对笔译实践不同目的和作用的考虑,周珏良提出了三种笔译方法:语法翻译法、分步翻译法和译述法,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译者群体和不同类型的翻译工作。

①语法翻译法。作为常年投身于基础教学的外语教师,周珏良从英语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语法翻译法,目的在于将翻译作为辅助英语学习的手段,通过翻译“快速获得一种外语的阅读能力”(王继辉,2020:1)。首先,找一本百十页的简明语法书,花两个星期时间集中阅读,可暂时不计其中的语音部分,重点关注并尽力记牢词法句法部分中的细节,先慢后快,通读数遍。之后,找一本该语言的简明字典和一本一百页左右的有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借助字典,根据自己已知的语法概念,逐字细读并翻译这部作品,不漏过任何字词,阅读速度逐渐加快,以此方法,两个月之内便可获得一般阅读能力。(王继辉,2020)

②分步翻译法。对于一般的翻译工作,周珏良提出了分步翻译法,包括四个步骤。首先,“逐字逐句译出,不要少掉什么东西,避免某些翻译腔”。第二,抛开原文,只看译文,依原文风格修改翻译文字。这时会发现好多问题,往往是上下文呼应联系问题和整体风格问题。这遍修改完

了,要求文字读来越顺畅越好。第三,对照原文,“看看走了意思没有”。最后,“放几天甚至几星期后再看”,这时“对原文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之前修改文字时“曾因为原文还大都记得、觉得还顺当的许多地方,现在都通不过了,需要再修改文字”。经过这一次修改,“一般说译文就可以拿出去了”(周珏良,1984:12)。

③译述法。对于理论性较强的文章,如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周珏良提出了“译述”法。首先对原文“了然于胸中”,下笔时“不要太拘泥于一字一句,主要在把意思表达出来,可以增、可以减,可以夹议夹述”。这样做的前提是“对所译文章要懂得透彻”,才能心里有底,“放得开手”,而且“实际做起来会发现真正需要‘述’而非‘译’的地方一般不多,却能极大地方便读者”(周珏良,1994:395)。周珏良不仅提出翻译方法,而且会亲身应用,《〈李尔王〉分析》就是其运用译述法翻译的成功范例。译述法可以说是译者目的性、受动性和能动性的有机统一(杨元,2004),和黄忠廉提出的变译理论也有共通之处,在翻译文艺批评文章时,采取译述法的翻译工作者较之于其他文学作品等翻译工作者享有更多的自由,意在传达原作主旨,把主要的信息转述给读者(黄忠廉,2000)。

综合周珏良提出的三个翻译方法,能够看出周珏良对待翻译工作时首先考虑读者,以读者为中心。周珏良对读者的类型和需求分析非常详细,会在此基础上充分思考翻译作品是否满足读者的期待效果、是否方便读者,是否能够发挥读者所需要的作用。周珏良所提出的翻译方法既有比较普遍适用的翻译方法,也有针对具体情况的翻译方法,得以较好地兼顾翻译的效率和翻译的效果。

2.2 口译思想

2.2.1 口译和笔译的关系

周珏良清楚地意识到口译和笔译各有自己的一套技术,如果长时间从事其中一项工作,所养成的工作习惯可能妨碍另一项工作中的表现。他指出,“口译工作者在实地进行翻译中因条件的限制,一般推敲得较少,倾向于用简单、平行的句子,多半用通用的字,使用的语法结构可能不很精确,修词也可能不够洗练”,长此以往在做笔译时就有一定的缺点;同时,“习惯于作笔译的人,也可能感到口译太紧张,没有时间思考,做口译工作感到吃力”。(唐筼、周珏良,1958:321-322)

虽然口译和笔译的用途和方法存在差异,周珏良绝不认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只能专攻其一,不能全面发展,二者兼作。如果抓住这两种工作不同的特点,它们不但不会相

互损害,而且会彼此提高。首先,笔译可以是口译的基础,经常作笔译可以提高口译中的忠实性和语法修辞上的质量。第二,由于口译工作要求速度,不允许慢慢推敲,这种锻炼也会提高笔译工作的效率。所以笔译和口译工作不仅可以一人兼任,而且可以“相辅相成”。(唐笙、周珏良,1958:321-322)

2.2.2 口译工作方式的分类

周珏良将口译实践分为同时传译和连续传译两类,其中同时传译又分为简单的“耳语传译”和电气化的同时传译,即利用无线电广播或有线电话机的装备。口译员坐在传译箱中,通过耳机听取会场上的发言,同时把它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通过翻译箱中麦克风传到会场中各处的收听设备中,即现代意义上的使用口译设备的同声传译。周珏良介绍,这种口译方式首次在我国使用是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此外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是用这种方法进行十种语言的同时传译的。(唐笙、周珏良,1958:322)

第二种主要的口译方式是连续传译,就是在发言人全部讲完或讲完一部分以后,再由口译员进行翻译。这种翻译的方式在很多场合上都可以采用:如会议发言、宴会致辞、个别谈话、参事访问等等。连续传译有时是在一小段之后或三、四句之后进行,有时则是在一个较长的发言之后,这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一般说口译员必须通过训练,达到能够译相当长的发言,才能应付各种场合。(唐笙、周珏良,1958:322)

2.2.3 口译员的素质

周珏良将口译员的素质分为思想条件和业务条件。从思想条件而言,周珏良首先指出口译工作不是什么纯技术性的工作,口译工作者也不可能是什么中立的机器。口译员的头一个条件就是政治挂帅,必须是一个坚强的,有鲜明立场的无产阶级战士,而且要懂得党的各项政策。第二,口译的性质也要求口译工作者在思想意识上有较高修养,清除个人主义。第三,口译工作的性质决定口译工作者要在各种大小国际场合出现,所以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态度,时时不要忘了人们多少会通过自己来看我们的祖国。(唐笙、周珏良,1958:323-324)

从业务条件而言,周珏良将译员应具备的素质分为语言能力、声音素质、口译技能、背景知识、业务知识和心理素质六个方面。他认为口译工作者的本国语和外国语越流利越好,各种场合的会话都应当流利,对各式各样复杂句法和其他文法手段熟练掌握,对各种各类的词汇熟练掌

握。除了口语要流利之外,口译工作者在大多情况之下都是对较大听众进行翻译的,所以在发声和发音等等上也要有些训练,使听众能听得见,听得清。此外,口译工作者要能迅速而完美地把原来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思想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要能口译,需要有一定的练习过程才能较好胜任。口译工作者还要有丰富的知识,除太专门的知识一般不需要外,知道的东西越多越好。我国的口译工作者往往是专属某一部门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而且应当对自己部门的业务有些专门知识,这样在进行口译工作时就能有更好的效果。此外,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口译员还要能高度集中但又不过分紧张。要达到这个地步,一方面要靠译员在上述政治和业务方面的条件使自己有备无患,一方面也要靠工作中的锻炼,经验越多越足越能使人沉着不慌张。(唐笙、周珏良,1958:324-325)

2.2.4 口译的方法

对于如何培养自己作为口译员的素质,周珏良从语言能力、口译技能和背景知识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为了提高语言能力,需要向外语母语者学习,同时提高听的能力,阅读近代文学作品。第二,为了增加背景知识储备,要有意识有系统地阅读书报,如有可能,将原文和译文进行对照阅读,另外可以从工作中积累特定领域的知识和词汇。第三,对于同传练习,要注意区分有译好的稿子的传译、有原稿而没有译稿的同时传译,以及发言人不用稿子时的同时传译。耳语传译的练习方法,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声音既轻又清楚,此外大致和同声传译相同。关于交传的练习,可以借助视译的方法。(唐笙、周珏良,1958:325)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交传中非常重要的笔记,周珏良也总结出了可取的经验。他认为,口译员应该尽量采用一些自己熟悉的符号,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创造一些符号,主要能达到以下目的:在发言结束后,自己回头看笔记时一眼就能了解符号所代表的意思。笔记用哪一种语言记也没有一定之规,全看个人用哪一种方便。一般最好用要译成的文字记,例如在进行从英语到汉语的翻译时笔记就用汉语,甚至还可以利用一些第三种文字的个别单字,这样有时会更方便。笔记也不宜记得太多,口译工作者应主要靠理解,这就是说要抓住发言的中心思想,笔记只记个别关键的词句,传译时再通过记忆把整个内容贯穿起来。笔记的目的就是便传译能包括原发言的基本内容,尽量不漏任何词句。如果口译员忙于记笔记,力求全面,那就势必不能把主要力量放在理解发言的中心思想和逻辑发展上,翻译时容易吞吞吐吐,词不达意。这样,也就是要“舍己之

田而耘人之田”，代替了记录员，而没有完成译员的任务了。（唐笙、周珏良，1958：325）

2.3 翻译研究思想

周珏良数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翻译实践经验，“政治文学，外译中，中译外都搞过”，又因为“对文学理论有兴趣”，“对翻译理论也经常注意”（周珏良，1990：290）。兼具译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使周珏良能够超越翻译实践，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以及学科研究的关系进行思考。

2.3.1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关系

周珏良明确指出，“翻译实践不必等到理论上彻底了才能进行”（1990：284）。值得注意的是，周珏良认可“实践有待理论来指导”，但也注意到“即使没有完善的理论也照样可以有很好的翻译作品”。周珏良的措辞一向严谨，此处用了“很好的”一词，而非“完善的”或“完美的”，因为他认为这样的翻译作品不能说是“完美的”，因为“完美的翻译作品和彻底正确的翻译理论一样是不可能的”（1990：284）。作为译者，周珏良具有极佳的双语功底，王佐良称赞其“中国一般学外国文学的人没有他的中文根底，而中国一般谈比较文学的人缺乏他的外文修养”。即使不了解翻译理论，以其双语能力，周珏良也能做出相当好的翻译作品。但他仍然对翻译理论“经常注意”并提及了翻译应实现“效果对等”（equivalency of effect）（1984：9）。

2.3.2 翻译实践和学科研究的关系

周珏良在英美文学方面“是一个真正的专门家”（王佐良，2016：632），他在做翻译实践之余，将翻译实践与自己的研究工作相结合，对于翻译与研究的关系有自己的思考，特别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翻译与研究提出了三点看法。

首先，研究工作有利于避免翻译错误。周珏良认为，这个问题和各类翻译都有关系，以文学翻译为例，翻译文学作品从理解到表达都有很多东西需要斟酌，不做点研究工作在这两方面都会不足，以致出错。（周珏良，1984：11）

第二，研究工作有助于提高翻译质量。在翻译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时，如不做些研究，很难对原著有深刻透彻的体会，就更无从谈到“效果对等”。周珏良本人撰写了多篇关于英美文学的批评文章，并在其翻译的文学和理论文章中做了详细的注解，可见其文学研究工作对于翻译工作所起到的支撑作用。（周珏良，1984：11）

第三，翻译与研究相结合，有利于相关学科的系统引介。周珏良指出，当年（八十年代）的翻译太不全面，要译什么大家都译，对于其他也很有文学价值的作者却很少系统地翻译和介绍，这些都是相关的工作没有跟上的表现。周珏良也指出，这种现象“和规章制度可能有关”，“翻译对于研究者而言不算研究成果”，也就是说，规章制度没有鼓励研究者和翻译者去从事彼此的工作。（周珏良，1984：11-12）周珏良认为，将翻译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有组织的翻译”是个好主意，要组织、支持翻译那些“费时间、费力气、看的人少、卖不了多少本、但确实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对于商业价值有限但学术价值较高的作品，相关机构应当负起责任来，组织这类作品的翻译工作（周珏良，1984：12）。

2.4 翻译教学思想

周珏良不仅具备高超的翻译水平和高水平的翻译实践经验，而且“还有一个长处，即肯做教学上的基础工作”（王佐良，2016：633）。虽然经常接到外交部的借调或其他工作安排，周珏良始终心系教学，“几次出外工作，每次都回到大学来”，在大学里，“多数的情况下，教的是语言”（王佐良，2016：634）。但“语言课也值得教”，周珏良从未由于自己精通文学和翻译就轻视语言的基础教学工作。在为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课程之余，周珏良还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的教学工作，参与培养了包括李肇星在内的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高级翻译人才（姚斌，2022）。十几个学生的作业本，每一篇他都多次认真改，不放过一个错误和不恰当的地方（周启朋，2016）。周珏良对于学生作业批改认真详尽，对学生的教诲也是慈祥宽慰但也不失针砭直言，每每使学生“在此后的学习中受益匪浅”，而且“永远记得，并诚惶诚恐，愿继续努力”（李肇星，2005：1）。

关于翻译教学，周珏良认为英语专业本科高年级的课程设置中应当有翻译课。他认为翻译在外语教学中可以有两种性质，一是作为学习语言的手段，如通过外译汉可以提高精读的能力，通过汉译外可以培养使用外语的能力；另一是作为专门技术的训练，如文学的翻译、哲学的翻译，文件的翻译等等。以当年五年制的英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为例，在三年级以前的翻译基本上属于第一种，这种翻译最好不要单独设课，而是包含在口笔语实习等课里。四五年级的翻译课则主要是训练专门翻译技术的专业性的，所以应当是独立的课程。这种专业的翻译课也要把学习翻译技术和学习专门知识结合起来进行，如文学翻

译可以包含文学选读和作品分析;哲学翻译可以结合哲学选读来进行等等。此外当然还要设以训练较高级的口译技术,如会场翻译、同时传译等为目的的专门的口译课。(周珏良,1959:38-39)

强调翻译教学对于英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必要性之余,周珏良也看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进阶的语言能力不适合作为必修课,而更适合作为选修课来开设,体现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他指出,在四五年级开设这些课程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学生们都要学,可以使有些学生有所选择,体现一种分科的意思,比如说将来打算做教师的人就可以多选语言、文学方面的课。打算做翻译的人可以多选翻译方面的课程等等(周珏良,1959:39)。

3 翻译思想的启示

同时代的国内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定义多聚焦于译文产生和效果,将原文的理解作为不言自明的一个隐含条件,而周珏良提出翻译的本质包括理解,对于翻译的定义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他对于译文语言风格的选择标准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而且他认为应针对不同要求的读者提供不同的译本,这一构想虽未普遍实现,仍然不失其指导意义,较为适合由他所提倡的“有组织的翻译”来实现(周珏良,1984:12)。

周珏良关于口译的集中论述出自其1958年发表的文章。当时他尚未在外交部翻译室担任领导职务,但已参与了朝鲜战争的谈判翻译工作和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工作,对于政治翻译活动中口译员的素质有了第一手经验和观察。因此他关于口译的论述不仅是其作为译员的个体看法,更是二十世纪50年代难能可贵的源自口译实践经验的口译思想总结。周珏良关于译员业务素质培养的观念在如今的口译培训中普遍体现,特别是关于口译和笔译能够兼而得之并可相互促进的观点对于现在的翻译教育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周珏良对于口译练习的方法的总结不仅系统化,而且注重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与国外口译工作者和研究者所总结出来的观点多有不谋而合之处。他所提出的交传笔记的做法高度符合吉尔所提出的交替传译精力分配模型,可见周珏良的口译思想在其时代是非常领先的,而且是相当科学的。

虽然周珏良仅凭出众的双语能力也能做出相当好的翻译作品,但他仍然对翻译理论经常注意,可见他会对翻译理论主动了解并加以吸收应用。但是周珏良不唯理论,还指出“彻底正确的翻译理论”是“不可能的”(1990:284),体现了他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二者关系的辩证看

待。周珏良认为相关机构应对商业价值有限但学术价值较高的作品进行“有组织的翻译”(1984:12),这一观点和我国目前提倡的“有组织科研”不谋而合,可见其远见卓识。结合周珏良当时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一职,能够看出他的立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翻译工作者或研究者的范畴,是在对中国翻译工作的整体格局和长远发展作出思考和谋划。

周珏良重视教学、乐于教学,并未因为繁忙的翻译实践任务而轻视教学,也并未因为部委频繁的借调工作而放弃教学,充分体现出他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和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是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生动体现。周珏良对于翻译教学有自己的思考,提出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应包含专门的翻译技能类课程,其中应有口译课并分门别类,如文学翻译、哲学翻译、会场翻译、同时翻译等,可见其对于自己所教授的课程并不局限于完成教学任务,而是有观察、有思考,并将课程置于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全景中去思考教学工作。无独有偶的是,以塞莱斯柯维奇为代表的巴黎高翻学派开展口译研究的初衷正是为了服务于教学(Pöchhacker, 2013),这也是周珏良的翻译思想与国际学界同频共振的又一印证。

4 结语

周珏良既是翻译工作者也是翻译研究者和教学者,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肇星,2015:1)。在翻译实践方面,他多次承担党和国家重大外交活动的口笔译任务,完成重要政治文献的笔译任务,同时留下了语言优美、形神兼备的文学翻译作品。在翻译理论方面,周珏良对于翻译的本质、目的、作用、分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根据翻译作品的不同用途提出了三种翻译方法,对笔译教学课程设计和内容进行了设计,并且总结归纳了口译的分类、学习方法和口译员应具备的素养,为我国早期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当下翻译学科的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由于时间、篇幅和资料的限制,本文主要聚焦周珏良对翻译工作所做的论述,然而周珏良对于翻译的实践和思考远不限于此,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寻和总结。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纪念周珏良先生百年诞辰研讨会举行[EB/OL]. (2016-06-20) [2025-01-10]. <https://news.bfsu.edu.cn/archives/255138.htm>.
- [2] 北京外国语大学. 周珏良教授[EB/OL]. (2011-09-15) [2025-01-10]. <https://www.chinadaily.com.cn/dfpd/>

bw70/2011-09/15/content_13695499.htm.

[3] 方绚. 邂逅周珏良[N]. 东方早报, 2016-9-4.

[4] 黄忠廉. 翻译变体[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5] 李肇星. 我的英文写作老师周珏良[N]. 济南时报, 2005-10-4.

[6] 刘德有. 中共八大的同声传译[J]. 百年潮, 2012(2).

[7] 唐笙, 周珏良. 口译工作及口译工作者的培养[J]. 西方语文, 1958(3).

[8] 王继辉. 为“语法翻译法”说几句话[EB/OL]. (2020-01-22) [2025-01-1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g0ODM5Nw==&mid=2247493591&idx=1&sn=8805d2b9ada667c461620ec28f984a49&chksm=e92f859ba84f03e8c75846db3d9d2fd411df494333bb2faa879bf9bdf0e4cce8f516cad599c#rd.

[9] 王佐良, 怀珏良[A]. 见王佐良. 王佐良全集·第十卷[M].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2016.

[10] 王佐良. 序[A]. 见周珏良. 周珏良文集[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11] 徐天. 名士周珏良: 为什么被认为‘最有资格’搞比较文学? [EB/OL]. (2022-09-03) [2025-01-15]. <https://www.chinanews.com.cn/dxw/2022/09-03/9843941.shtml>.

[12] 杨元. 周珏良“译述”法及其译作《〈李尔王〉分析》[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

[13] 姚斌. 新中国高级翻译人才培养的早期探索和

启示——以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班为案例[J]. 中国翻译, 2022(3).

[14] 《中国翻译家词典》编写组. 周珏良[A]. 见《中国翻译家词典》编写组. 中国翻译家词典[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15] 周礼均. 追忆似水年华[EB/OL]. (2019-8-9) [2025-1-16].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4122534.

[16] 周珏良. 外语院系四五年級应有怎样的外语课程[J]. 西方语文, 1959(1).

[17] 周珏良. 翻译杂谈[J]. 世界文学, 1990(3).

[18] 周珏良. 论翻译[A]. 见周珏良. 周珏良文集[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19] 周珏良. 漫谈翻译[J]. 中国翻译, 1984(9).

[20] 周启朋. 父亲的师德[EB/OL]. (2016-9-4) [2025-01-1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3400.

[21] 周一良. 文革后的二十年[A], 见周一良. 钻石婚杂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22] Pöchhacker, Franz. The Position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A]. In Carmen Millán & Francesca Bartrina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3.

作者简介: 李天竹(1987.07-), 女, 锡伯族,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 翻译实践、教学与研究。